

# 中华书局风雨百年路(上)

◆ 李菁

## 民国“新生儿”

1912年1月1日,上海福州路东首老巡捕房对门的楼楼下,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。创办者是出版界的三个年轻人——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、戴克敦和文明书局的陈寅。这一天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,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。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历史时刻,陆费逵为民国“新生儿”取了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名字——中华书局。

中华书局的核心人物陆费逵年仅26岁。陆费逵,字伯鸿,号少沧,祖籍浙江桐乡,1886年9月17日出生于陕西汉中。“陆费”是个复姓。很多人曾以为他姓陆,名费,字伯鸿,因而有称之“陆费伯”、“费伯”或“陆伯鸿”。为此,陆费逵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解释。

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出版人的陆费逵,一生并未受到多少正规教育。他后来形容自己“幼时母教五年,父教一年,师教一年半,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”。“父亲是靠着超人的顽强毅力自学成才的。”在北京三路居的居所里,87岁的陆费逵铭琇回忆起父亲,仍充满敬意。

陆费逵17岁步入社会,但自修读书的好习惯一直保持下来。

“因为买书困难——一方是经济困难,一方是购书不易——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,一面营业,一面有书可看。”1904年,18岁的陆费逵与几个同学集资1500元,在武昌横街租了间房子,开办了一家名为“新学界”的书店,陆费逵任经理,没想到这也由此成为他后来一生事业的起点。

彼时交通发达、商业兴隆的武

中华书局 100 年的历史,也是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。



中华书局上海总站(1916年落成)

昌,也是受革命思潮影响颇深之地。年轻的陆费逵深受这股思潮影响,并在1905年加入反清革命团体“日知会”。不久,他辞去书店工作,在汉口《楚报》任记者和主笔。短短几个月间发表了大量文章,讥评时政。因为批评清政府腐败,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查封《楚报》,他也被通缉。当他得知消息时,鞋都来不及穿,一双拖鞋踏上轮船到了上海。

在各种新思潮、新观念交汇的上海,陆费逵很快找到了立足之地。1906年,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工作。文明书局是上海一家影响较大的民营出版机构,以出版教科书为主。

彼时,在上海滩的出版机构当中,商务印书馆是最有实力也最有影响的一家。其掌门人张元济曾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变法失败后的张元济绝意仕进,把所有心血投入了出版事业,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文化重镇。1904年,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

系,但往往发行人不懂印刷,印刷人员不知发行,能编辑的又不知发行和印刷,陆费逵既能操笔编书,又对发行印刷有所研究,所以高梦旦把陆费逵作为人才向张元济举荐。1908年秋天,22岁的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,任国文部编辑员。短短半年后,他便被任命为出版部部长、交通部(相当于现在的公共关系部)部长。在商务印书馆内兼职的人,都是极受重视极为能干之人,而陆费逵兼着三个部长的职务,工作能力之强以及所受信任之深可见一斑。

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,可以说是维新运动所导致文化和教育变革的一个结果。其掌门人张元济曾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变法失败后的张元济绝意仕进,把所有心血投入了出版事业,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文化重镇。1904年,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

了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,其后又编了高小、中学教科书。

教科书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,这也正是陆费逵的兴趣所在。当年他闯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,便是开办一所学堂,虽然仅存在了8个月,但他对教育的关注一直没有转移。

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个身份是《教育杂志》的主编,精明的陆费逵借此渠道,结识了许多教育界人士。

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走向它最后的岁月。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,陆费逵敏感地嗅到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。可是商务出版的《最新教科书》已经多年未变。商务内部一些有远见的人劝张元济准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的教科书。张元济犹豫不决,“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,教科书不必改”。此种情形令陆费逵心生失望,遂决定“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”。

早在文明书局工作时,陆费逵便编纂过一套新式教科书,因为资金问题未能如愿。这个历史关头,他果断决定进行“教科书革命”。在他看来,如果民国建立了,而教科书上还写着过去封建皇帝那一套,肯定是行不通的。所以他拉上一批人,一起编教科书。

陆费逵选定民国成立的当天为中华书局挂牌,“将来,遇民国成立纪念,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”。此举也在冥冥中使中华书局的历史与一个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。

## 民六危机

中华书局真正的营业开始于2月初。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,启动资金只有区区2.5万银元,仅为出版界“大佬”——商务印书馆资本金的

1/30。陆费逵的个人声望,亦远不能与张元济相比。最初几天的情形,也颇令这些踌躇满志的年轻创业者们沮丧。据《中华书局大事纪要》:“营业之始,第一日仅售洋五元,惴惴之情现于颜色,第二日售百余元,第三日始批发,增至五六百元。”

可是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陆费逵的眼光和判断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,规定各种教科书令合于共和国宗旨,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。于是内容合乎共和体制的“中华教科书”,成为被追捧对象。当时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十数册,“日间订出,未晚即罄,架上恒无隔宿之书,各省函电交促,未有以应”。“中华教科书”几乎独占中小学教科书市场,这也给中华无形巨大的商机。开办第一年,营业额达到20多万元,他们买了六台印刷机,开了自己的印刷所。

至1913年完全出齐的中华教科书,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,令人耳目一新,立即风行全国,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。中华书局从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。

虽然商务印书馆也马不停蹄地赶制出《共和国教科书》,但是占得先机的中华书局早已赚得盆满钵满。1913年4月,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,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.5万元增至100万元。到了1916年6月,中华书局资本已增到160万元,在全国设立的分局也多达40多处,员工也由最初的不到10人发展到2000多人,一跃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,国内第二家集编辑、印刷、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。

新民晚报,日发行量103万份,家庭订阅80万份,占上海报纸发行总量50%

新民晚报



第一大报 上海符号